

1901 — 1995

# 诺贝尔文学奖



# 名著总解说



1901—1995

# 诺贝尔文学奖 名著总解说

刘文刚 姜福波 主编



(辽)新登字 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诺贝尔文学奖名著总解说/刘文刚主编;关福堃主编.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  
ISBN 7-5313-1594-7

I. 诺… II. ①刘… ②关… III. 诺贝尔文学奖金-作品  
-文学研究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4367 号

诺贝尔文学奖名著总解说  
Nuobeier Wenxuejiang Mingzu Zongjieshuo

---

著 作 者:刘文刚 关福堃  
责任编辑:左云霖  
责任校对:晓 春 惠 凡  
封面设计:杜凤宝

---

出 版 者:春风文艺出版社  
邮 编:110001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电 话:3864927

---

印 刷 者:锦州印刷厂  
地 址:锦州市山西街 34 号

---

发 行 者:春风文艺出版社

---

字 数:600,000  
字 本:850×1168 1/32  
印 张:25  $\frac{1}{8}$   
印 数:1—6,000  
版 次: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5313-1594-7/I·1397  
定 价:48.00 元

## 导言：诺贝尔奖文学的现代人类文化意识

对人类精神的关注，历来是文学艺术的最高旨趣所在。按照诺贝尔遗嘱设立的文学奖，就是“奖给在文学领域里创作了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优秀作品的人”。经过近百年的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金榜现已收录了32个国家92位作家的名字（内有5人是历史学家或哲学家，按章程规定，“文学”不限于纯文学，“也当包括在形式或内容上具有文学价值的其他著作”）。由于种种原因，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并不总是很公正和恰当的，特别是早期的评选甚至疏漏了一些更有资格获奖的文学巨子，因而常常受到人们的责难和非议，但它仍然是现今国际社会中影响最大、地位最高的世界性文学大奖。每年一度的评奖活动，已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坛盛事。

诺贝尔文学奖的崇高地位，使任何当之无愧的获奖者都感到诚惶诚恐，艾略特把他的获奖看作是“上帝的宠召”；斯坦贝克更把获奖比作“与死亡亲吻”。诺贝尔文学奖所以能取得如此崇高的地位，不仅是由于它历史悠久、奖金额高，更是因为它的评奖标准始终把“理想主义倾向”放在首位，把评判的尺度始终定格在当代精神生产的最高品位上。这种集中反映诺贝尔遗嘱基本精神的“理想主义倾向”已成为所有获奖作家共同存在的创作倾向，从而在事实上形成了特有的诺贝尔奖作家谱系，

一个具有共同创作标帜的“文学家族”，正如196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所说，这是一个“擎着光明火炬的诺贝尔家族”。这个“家族”不是文学史上通常意义的共时性文学群体，而是一个由共同的精神脐带蝉联起来的历时性群体。所谓诺贝尔奖文学，便是由这一获奖作家群共同代表的文学。

---

按照诺贝尔的遗嘱，文学奖和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奖和医学奖以及和平奖相并列，颁奖活动也在一起进行，这本身就表明奖金创立者诺贝尔是从人类大文化的整体结构，从人类文明的健全发展上着眼，而不仅仅是从文学本身立意的。爱因斯坦说过：“但愿那种促使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设置巨额奖金的精神，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信赖精神，宽大和友好的精神，在那些决定我们命运的人的心里会占优势。要不然，人类文明将在劫难逃。”<sup>①</sup>于此可见，诺贝尔的理想主义不仅体现在他对人类科学技术进步的关注，更体现在他对人类道德精神成长的关注，其中内涵着对人类文化发展前途的深沉思考和热烈期望。

诺贝尔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也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主义信念既来源于他所处身的19世纪社会、文化环境，又远远地超越于他的时代和环境。他出身在一个献身科技发明事业的工程师家庭，但生性浪漫，富于诗人气质，自小便

---

<sup>①</sup> 爱因斯坦：《战争是赢得了，但和平却还没有》，《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第三卷第207页。

热爱大自然，喜爱诗歌，并具有特殊的语言才能，直至他 16 岁接受父命周游世界时，还梦想成为一个像雪莱那样伟大的诗人。后来虽终身从事发明创造，但早年对文学的初恋使他终生难以忘情。他特别喜爱的作家有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雨果、莫泊桑、巴尔扎克等，而他最喜爱、最敬重的是具有强烈理想主义信念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拜伦称雪莱是“人类中最无私最善良的人，他是为别人而牺牲自己的财富和情感，超过我所知道的任何一个人。”<sup>①</sup>这些话也几乎可一字不移地用来评介诺贝尔。在精神上，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血亲关系，都是同一文化精神传统的嫡子。在雪莱的创作和为人中，我们可以找到对诺贝尔所强调的“理想主义”的最可靠的诠释。

雪莱继承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想传统，接受了他的同时代人、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的影响，他的理想主义是对自由、解放、平等的未来社会的信心，是对人类的自救、自我完善能力的信心，他说：“我希望用自由与正义的思想，在我的读者心中燃起高尚的奋发热情，燃起暴力、歪曲的真理或偏见所从来没能在人类中完全消灭的对善的希望和信心。”（《伊斯兰的叛变》序言）在未来的自由社会中，“人类的心灵将汇合成一个爱和思想的强大环节，控制着种种自然力。就像太阳在无际的苍穹，高高地在众星和天体之上，发出灿烂的光芒。”（《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这无疑也正是诺贝尔的理想。诺贝尔说过：“我的理想，是为人类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而发挥自己的作用。”<sup>②</sup>为此，他不仅致力于科学技术发明，也重视文学

① 拜伦 1872 年 3 月 4 日致托乌斯·穆尔的信，转引自前苏联科学院编《英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第 420 页。

② 中岛都美子：《诺贝尔》，新华出版社，第 42 页。

艺术创作。他深知，在感召、激励人类精神进步，探寻人的存在价值方面，文学艺术能够发挥特殊作用。诺贝尔一生写过不少诗文，在语言的运用和艺术风格上，大都模仿雪莱的名作，有的甚至直接脱胎于雪莱的作品。他还写过一些小说、剧本。晚年，当他卧病在床时，还亲手创作了四幕悲剧《复仇的女神》。此剧在艺术上很难说是成功的，但在剧中，他鞭笞了人世间的伪善和怯懦，赞美品格高尚的人，充满了对人类道德精神的关注。

正是出于对人类社会未来的理想主义信念，诺贝尔对于现代人盲目崇拜和利用科学技术成果，特别是对自己所发明的烈性火药一直是深怀忧虑的。这些火药既被用于铁路、公路的建设和矿山的开发，也被用来制造武器，造成大规模的杀伤，这使他深深地为之苦恼和痛心。良知使他不能无视人类物质文明的片面发展给人类社会进步带来的严重危机。这种危机在提醒人们：人类凭借着自己的智力已经作出，并将继续作出很多伟大的发明创造，但人的精神是否成熟到相应的程度，使之不至于利用自己手中的巨大物质力量去作出非理性的或疯狂的举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的幸福和进步是否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不仅是诺贝尔思考的问题，也是当代一切有良知的科学家都在思考的问题。爱因斯坦说：“人类真正进步的取得，依赖于发明创造的并不多，而更多的依赖于布兰代斯（2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D·布兰代斯）这样人的良知良能。”<sup>①</sup>19世纪的诺贝尔显然也有这样一种批判意识。诺贝尔的同时代人，著名化学家、生物学家、微生物学创始人巴斯德（1822～1895）也

---

① 海伦·杜卡斯、巴纳希·霍夫曼：《爱因斯坦谈人生》，世界知识出版社，第75页。

说：“文学翱翔于科学之上。”<sup>①</sup>应该看到，对科技成就的批判意识，是深潜在诺贝尔遗嘱之中最有深远意义的理想主义精神之一。

自然科学与文学艺术、科技文化与人文精神的对立和冲突产生于 18 世纪中期的西方工业革命及其所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革。一般说来，科学技术所开发的主要是人类的物质世界，而文学艺术所探究的重在人类的精神世界；科学技术的思维方式主要是理性的、逻辑的，而文学艺术思维主要是直觉和想象，二者形成相互依存的互补关系。人类生存的完整世界既有赖于科学技术所提供的物质力量的支持和保障，又远远超出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创造范畴之外。人的存在价值、生命的终极意义以及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等虽然也是科学理性的思考对象，但并不是科学理性所能穷尽的。它总要超越无情的逻辑和因果关系之上，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一切可以认识、把握的感性环境。因而，物质和精神，感性环境和对它的超越，是人类完整存在不可或缺的两个层次。可是自近现代工业社会出现以来，片面发展的科学技术一方面前所未有地解放了生产力，扩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它又像国家、社会一样，一旦被偶像化，就又变成了对人异在的客观力量，反过来窒息人的生存自由，并在相当程度上破坏了人的生存完整，使人性产生畸变。早在二百多年前，这两种文化的冲突便使思想界分裂为两大派别，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哲学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全力的支持和辩护，而另一些持守人本主义思想的哲学家、文学家则为之深感忧虑和不安，并终于在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汇成了一股以批判现代工业文明为主要特征的浪漫派思想文化运

<sup>①</sup> 路易·多洛：《个体文化与大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94 页。



动。

这股浪漫派思想文化运动兴起于德国,继而扩展到英法。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说,在古希腊,人性是完整的;但在近现代社会,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分裂一切的理智”不仅使社会与个人,而且使个人本身发生严重的分裂,人失去了内心的和谐和完整性,整个社会变成了“一种精巧的钟表机械”,而人不过是束缚在这架机器上“一个孤零零的断片”。席勒与康德一样,都认为审美观照与科学认识是性质不同的思维方式,唯有诗、审美才能把人从异化的存在中拯救出来,使之从备受束缚、被动的存在进入自由自主的存在。作为这场浪漫派思想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普遍推崇审美的解放作用,谢林说:“我坚信,理性的最高方式是审美的方式,它涵盖着所有的理念……没有审美感,人根本无法成为一个富有精神的人,也根本无权充满人的精神去谈论历史。”<sup>①</sup>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人物更把诗看作人类至高无上的精神器官,德国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说:“诗才是真正绝对的实在,这就是我的哲学的核心,越富有诗意,越真。”<sup>②</sup>英国诗人雪莱在《诗辩》中系统地论列了科学认识和审美观照在思维方式上的不同。他和席勒一样,深刻地认识到科学技术的片面发展给人类文化带来的深刻危机,他说:“我们吃下去的已多过我们所能消化的。若干科学部门的成就已扩大人类王国对外在世界的控制范围,但是这些科学部门由于缺少诗的机能,也相应地局限了内在世界的一些因素,自己却仍旧是奴隶。为了减少劳动和组合劳动而作的一切发明,会被错用来加剧人类的不平等,——这种情况不归

<sup>①</sup> 谢林:《艺术哲学文选》,1982年德文版,第96页。

<sup>②</sup> 《诺瓦利斯文选》,1960年德文版,第二卷,第647页。

咎于机械技术的成就，又归咎于什么呢？”<sup>①</sup>

诺贝尔遗嘱精神的形成，正是以19世纪西方思想文化界内部分裂和矛盾冲突为背景的。这种矛盾冲突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科学与价值、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二律背反性冲突。诺贝尔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他并不一般地否定科学技术对于推动人类进步的历史作用，而是像雪莱那样，反对对科学技术的盲目崇拜，崇扬以爱为核心的人文精神。诺贝尔的“理想主义”，既继承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理想，又着眼于现代社会的文化冲突，接受了浪漫派思想文化运动的影响，表现出对现代科技文明的批判精神，和对于实现科学与价值协调发展、科技文化与人文精神携手并进的人类大文化前景的信念。正是这种相当富于激进色彩的理想主义精神，决定了诺贝尔奖文学的现代人类文化意识的取向，使之始终以诚挚的爱心关注着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以直面人生而不是矫饰现实的态度来揭示现代文明的种种痼疾，以深沉严肃的思考而不是肤浅、虚假的乐观主义来探索人类的存在价值和心灵的自我拯救。

## 二

按诺贝尔遗嘱设立的诸奖之中，没有什么奖能比文学奖的评选更困难，因而也更容易招致非议了。无可讳言，评选工作本身在人员组成、工作程序等方面确实存在着一些可议之处，特别是对评选标准的把握方面存在的问题，有时已直接影响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声誉，甚至造成信任危机。如颁奖给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就曾引起过不小的争议。联系到瑞典学院一直拒

<sup>①</sup> 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下卷，第55页。

斥对高尔基的提名，长期拖延对肖洛霍夫的颁奖来看，很难认为瑞典学院对前苏联文学的态度是完全正常的。1964年，萨特在拒绝受奖的声明中指出：“肖洛霍夫和帕斯捷尔纳克两人，瑞典学院竟先颁奖给后者；而且获得此奖之唯一苏联文学，竟是一部在外国印行，在其国内被查禁的书。此事殊堪扼腕。欲恢复平衡，可以从反方向做相同的举动……”<sup>①</sup>瑞典学院果然于次年向肖洛霍夫颁了奖，此时距其获奖作《静静的顿河》的全部发表已达25年之久。在现代社会，任何文化活动都很难完全与政治无涉，但诺贝尔的一生素来对政治活动缺乏兴趣，他的遗嘱也主要是文化精神性质的。瑞典学院如能充分尊重诺贝尔的遗嘱，就应该对现代社会的国际政治冲突表现得更超脱一些。

此外，瑞典学院多次颁奖给自己的成员，也常引起人们的批评。至今为止，瑞典本国作家已有6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中除拉格洛芙而外，其余5人在获奖之前均为瑞典学院的成员。我们承认这些获奖者都是有一定成就的作家，但相对说来，如此频频地给本国作家，特别是给颁奖单位的成员颁奖，是否有失公正呢？这一点，连瑞典本国的舆论界都为之哗然。1974年，在颁奖给雍松和马丁松之前，瑞典著名评论家奥克·原森发表评论说：“……瑞典学院竟然要将诺贝尔奖颁给他们自己的成员，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今年的这项决定已经使一个统计数字无可避免地发生突变，因为总共才72位得奖人中，有十二分之一竟都是瑞典人。这个数字可能会使一些老练的评论家怀疑，瑞典现代文学当真是全世界十二个著名的文学之一吗？”

但另一方面，在众议咻咻的批评者中，也有不少人由于对

---

① 若利韦·斯特龙伯格：《诺贝尔文学奖秘史》，中国友谊出版社，第277页。

诺贝尔遗嘱精神缺乏认识和理解，单纯从作家的创作成就和知名度上着眼，把诺贝尔奖的评选类同于一般的文学评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实在是没有什么能比审美的趣味和评价标准更富于歧异性了，几乎是在年年的评选之后，都会有程度不同的争议。诺贝尔本人对理想主义倾向并未作过任何具体解释，瑞典学院对此的理解和把握也未必完全符合诺贝尔的初衷，正如瑞典学院院士、著名诗人艾斯普马克所说：“颁赠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试图解释遗嘱中语言含混的语句的一连串尝试的历史。”<sup>①</sup>因此，他们只能从特定的文化视角上，选拔那些既能用强而有力的艺术手段表现现代人类的心灵世界，又能站在现代思想高度予以解释的作家和诗人。借用瑞典学院常任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的话来说，获奖者应是这样一些作家，他们能够勇敢地致力于人类生存现状的探究，“在高度艺术的水平上，对这个时代、这个世界，以及人类的永恒境况，提出一个解释来。”也许正因为如此，瑞典学院近20多年来常把奖金颁给知名度并不很高，但更富于现代意识的作家，如在80年代颁奖给米沃什、卡内蒂、戈尔丁、布罗茨基等，而有意冷落了那些知名度虽很高，艺术上虽更成熟，但在表现现代意识方面显然已有些过了时的作家，如阿根廷的博尔赫斯、英国的格雷厄姆·格林等，虽然他们都是多年的候选人。

“理想主义倾向”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容，20世纪的诺贝尔奖文学的“理想主义”不可能与19世纪的诺贝尔的“理想主义”完全一致，但其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还是密不可分的。这是因为20世纪的人类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实际上是由19世纪的文化危机发展而来的；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太空航天技

<sup>①</sup> 艾斯普马克：《诺贝尔文学奖》，1986年瑞典版。

术为代表的现代高科技也是建立在 19 世纪工业文明、科技成就的基础之上的。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以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和马尔库塞的法兰克福学派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潮也与 19 世纪的浪漫派文化思潮一脉相承。20 世纪的时代特征在于，人类征服自然的手段和力量从来没有如此强大过，而人类的生存自由和尊严也从来没有如此困窘过。由于高科技日益确立了它在人类大文化圈中的霸权地位，由于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危机和战争所带来的诸多严重后果，人性的完整、人的存在价值和终极意义几乎已成为本世纪思想文化领域内最突出的问题。因此，对现代社会文明危机的思考，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探究，是现代人类文化意识的核心内容之一。

翻检诺贝尔文学奖谱系，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对本世纪世界文学历史进程的曲折反映，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现代人类文化意识的编年体式的记录。为了更完整地把握诺贝尔奖文学所反映的现代人类文化意识，我们可以把近百年来的颁奖史粗略地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从 1901 年首次颁奖给法国诗人苏利—普吕多姆至 1914 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中断评选，大多数获奖作家的主要创作活动都是在 19 世纪后期。直至 1912 年，霍普特曼才作为第一位“当代人”出现在颁奖台上。这些作家的创作大都符合传统文学的风范，如诗人普吕多姆、米斯特拉尔、卡尔杜齐、泰戈尔等都是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余绪的继承者，他们的作品虽然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人文意识与现代社会的冲突，但对人类的未来一般说来都还是满怀乐观情绪的。作为剧作家、小说家获奖的比昂松、埃切加赖、显克维奇、霍普特曼等人的作品，虽然较富于内省意识，但主要是以对社会的政治、宗教和道德习俗

的批判为主。这一时期最富于现代意识的是剧作家、诗人梅特林克，但他的代表作《青鸟》和拉格洛芙的作品一样，都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成功地描摹出人心光明的一面”。总之，从这一时期的评选活动来看，瑞典学院和欧洲文坛（法兰西学院、英国作家协会、西班牙学院等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举荐单位）的保守倾向是比较突出的，他们没有能大力肯定早在19世纪中后期即已开始出现的对传统文化和科技文明的批判更带有激进色彩的作家，如列夫·托尔斯泰、易卜生、左拉、斯特林堡、哈代等，因而给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留下了永远令人扼腕叹息的历史性遗憾。

自1915至1945年这30年间有26位作家（包括哲学家柏格森）获奖。从这一时期的评选来看，瑞典学院已开始逐渐摆脱初期摸索阶段的拘谨、保守的态度。非理性的生命哲学创始人柏格森、意大利怪诞剧作家皮兰德娄和美国现代剧作家奥尼尔的获奖表明，现代文化和文学观念已开始进入斯德哥尔摩的圣殿。由于这一时期的获奖作家主要是从30年代以前的作家中遴选出来的，以叙事文学成就获奖的作家除皮兰德娄外，几乎全是现实主义作家。但他们的创作大都相当鲜明地体现出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如罗曼·罗兰、彭托皮丹、法朗士、萧伯纳对资产阶级传统文化的无情批判；汉姆生、托马斯·曼、刘易斯、高尔斯华绥、布宁等人对现代工业文明和建立在这一文明基础上的惟利是图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激烈否定。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判和否定大都超出一般的道德伦理范畴，而不同程度地立足于生命哲学的高度，推崇生命的觉悟与活力。他们对人性的完整和自由的关注，远远超出对社会的公正和平等的关注，在托马斯·曼、刘易斯、高尔斯华绥、皮兰德娄、奥尼尔等人的创作中，对人性异化的探讨已成为相当突出的主题

之一。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霍尔斯特穆高度赞扬皮兰德娄的小说和戏剧，认为他的小说《开拍！》(Si gira! 1916)是部“表达他的时代意识的小说，将他对支配我们生活，使我们生活机械化的拜物主义的嫌恶和恐慌表露无遗。”并特别指出他的小说和戏剧在心理分析上的深度。而在评价奥尼尔的剧作时，霍尔斯特穆则说，《毛猿》“是反抗机械文明的力重万钧之作”，奥尼尔的戏剧主题“往往是描写一个人为了承受外在的压力，而使个人原有的性格扭曲，变成了虚伪的性格，最后造成了人格上的分裂。”（颁奖辞）

这一时期以诗歌创作获奖的作家如施皮特勒、叶芝、卡尔费尔特、米斯特拉尔等虽然都或深或浅地与19世纪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诗歌血脉相连，但也带有鲜明的现代文化批判意识。施皮特勒的获奖作《奥林匹亚的春天》就是一部诗体“故事新编”，剧中扁平足族人欲以人工太阳剥夺宇宙之神阿波罗的权柄，用毒瓦斯谋害他，象征性地表现了现代科技文明对人类古老文明和人类自身存在的严重威胁。叶芝的著名诗集《古堡》和卡尔费尔特的诗集《弗里多林之歌》、《弗里多林乐园》也都充满了对现代科技、城市文明的厌恶，或是转而赞美中世纪的拜占廷文化，或是重返大自然的怀抱，歌唱古朴的乡土家园。从这一时期的评选来看，瑞典学院对“理想主义倾向”的把握虽然明显地增强了现代人类文化意识，但通常只是把它解释为“对人类的深刻的同情”、“广泛的人道主义”而已，相对说来还是比较温和的。它仍然不肯及时支持在二三十年代即已锋芒毕露并进入创作极盛期的现代作家如纪德、黑塞和艾略特等。以黑塞为例，他多次被提名，但当时都因被学院评为“道德上的无政府主义”而落选。直至1946年，黑塞才由于“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获得该奖。

二次大战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出现划时代的变化。大战期间，瑞典学院内几位德高望重的资深院士相继去世，递补上来的几位均属较年轻的一代。评选的对象也不再限于30年代以前那些作家，而多是20年代以后出现的众多具有前卫意识的文坛才子。由于获奖作家绝大多数都是现当代世界文学的一等星座，因此诺贝尔文学奖的声望也得到空前的提高。自1946至1970年这25届评选的26位得主中，有16人是现代派作家。其中，既有二次大战前的代表作家纪德、艾略特、福克纳等，也有二次大战后的代表人物加缪、萨特、贝克特等。他们大都是在本世纪前半期开始涌现出来的现代派文学巨擘。在为艾略特颁奖时，瑞典学院的资深人物安德斯·奥斯特林也顺便向已于1941年去世的乔伊斯致意，称《荒原》和《尤利西斯》是“1920年同时问世的杰作”。而在为贝克特颁奖时，瑞典学院又强调指出，“这位小说、戏剧新表达形式的先锋，承袭了乔伊斯、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的文学传统。”可以说，这实际上是在为本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加冕。反之，现代派作家进入诺贝尔奖文学之林，也提升了诺贝尔奖文学在现当代世界文化中的地位，赋予它以强烈的现代文化意识。在表现现代人的生存焦虑、迷惘、困惑、梦魇和绝望方面，实在是没有谁能与现代主义文学相颉颃了。在艾略特的笔下，整个世界被写成干旱无雨的“荒原”，一切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中；在福克纳的小说世界里，生活如同“一个白痴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在贝克特的戏剧舞台上，人生被写成是对“明天”的毫无意义的“等待”。这一切是否与诺贝尔所规定的“理想主义倾向”相违背呢？我们知道，在本世纪初，托尔斯泰、易卜生、哈代等人的落选，就是因为他们的创作被看成是对道德持怀疑态度，或对人性作悲观主义的描写，缺乏“理想主义倾向”。而



今，诺贝尔委员会的衮衮诸公终于认识到，对人类生存困境的真实写照恰是最富于历史深度的“理想主义倾向”。瑞典学院常任秘书吉耶洛在致贝克特的《颁奖辞》中说：“黑暗本身将成为光明，最深的阴影将是光源所在。……人自叔本华深沉痛苦中得来的力量超过谢林的爽朗天性；人在帕斯卡尔苦闷的怀疑中找到神的恩宠，胜过莱布尼茨盲目信仰理论上的各种世界的美好。”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中，从资产阶级内部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从来不曾间断过，但传统文学的“理想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总是抱有相当的保留态度，他们多是在道德意义上否定那些违背社会正义、公理的邪恶现象，他们真诚地相信，一旦消灭了这些邪恶，就会使社会的正义普遍实现。而现代主义文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则要激进得多，他们不仅在道德意义上，更在社会和人生存在的本质意义上提出怀疑和否定。因此，虽然他们笔下的世界没有未来，没有理想，没有人道，到处充满了邪恶和荒诞，却并不意味着这些现代主义作家对人类完全失去了理想主义信念。恰恰相反，在全面否定的背后往往隐含着最激进的追求，一种浮士德式的超越一切现实的追求；在凄如挽歌的低沉诉说之中，大都激荡着对苦难人类的救赎之情，正如辛格所说：“对于有创造力的人，悲观并非颓废，而是对救赎人类的一种强烈的热情。”于是，我们在海明威的笔下看到的是“英雄式的悲怆”；在萨特的作品中，是对“自由”的悲壮选择；在贝克特的戏剧中，是“绝望的勇气”；在加缪的小说中，是“西西弗精神”。这些作家对于人类未来的理想主义信念不再是寄托在任何外在的宗教信仰、社会改良和英雄救世上，而是诉诸于人类自身，诉诸于自我救赎的努力；他们不是再造一个新的“理想国”，以虚幻的未来安慰人心，而是注重对现代人的